

全球智库半月谈

阻碍 TPP 的真正原因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和机遇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利率自由化

2014 年年底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

人民币仍被低估吗？——来自新购买力平价估计的反驳

美菲安全关系的强化将使中美关系疏远

本期编译

陈 博

程覃思

杜哲元

郭子睿

黄杨荔

孔莹晖

李 骁

李 想

刘 洁

刘兴坤

马文龙

苏 丹

许平祥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黄杨荔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阻碍 TPP 的真正原因	4
---------------------------	---

导读：虽然日美两国在高端贸易磋商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双方仍存在很大分歧，这阻碍了两国的 TPP 谈判进程。本文认为，最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两国各自的政治利益追求。

凯恩斯主义终于死了	6
------------------------	---

导读：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不再盛行于英国，以及目前宏观政策主要由什么学派主导。

全球治理

货币市场基金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非肇事者	8
-----------------------------------	---

导读：金融危机的出现给全球经济特别是货币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为了挽回紧急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作者认为货币市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是受害者而并非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肇事者。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和机遇	10
----------------------------	----

导读：风险与机遇是伴生体，本文讨论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公司、员工的风险共担机制，以及其在经济升级和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并阐述了政府如何帮助人们管理风险，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受益。

经济政策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利率自由化	14
----------------------------	----

导读：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会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从而降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因此，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需要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中国：重要的不只是增长——金融体系同样关键	16
------------------------------------	----

导读：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金融市场上违约数量增多使得不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担忧。作者详细探讨了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信贷错配问题，并对大量项目薄弱的财务基础表示担忧。最后，作者提出了简单的政策建议。

聚焦中国

人民币国际化——访巴里·艾肯格林 19

导读：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引发了国际化动机、金融改革、信贷及国际金融稳定一系列相关问题。为更好地理解这些领域的情况，CIGI 高级研究员王宏英（音译）专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NBER 研究员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

2014 年年底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 21

导读：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数据显示，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将于 2014 年年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作者认为，GDP 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国民财富才是衡量经济规模的合适指标。而中美财富总额仍有很大的差距，短期内中国不可能超越美国。

房价下跌对中国银行业影响几何？ 23

导读：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会造成大量房产开发商违约，然而其危害并不局限于此：一方面房价下跌会导致企业以房产为抵押品的借款能力降低，影响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房价下跌会导致居民财产贬值，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投资与消费的降低又会影响整体经济，导致更多违约产生。

人民币仍被低估吗？——来自新购买力平价估计的反驳 26

导读：本文基于国际物价比较（ICP）项目 2011 年的数据，采用两种模型估算了人民币的被低估程度，结果出乎意料：2014 年人民币已不再被低估。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即将结束。

战略观察

克里米亚之后：普京的资产负债表 29

导读：俄罗斯外交擅于“快跑”，西方尤其是欧盟外长擅于长跑。莫斯科对于机动军事力量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在乌克兰的其他长远外交政策是失败的。俄罗斯基于“大棒”（禁运和制裁）和“胡萝卜”（提供廉价的天然气和更大的市场准入）的强势外交，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莫斯科相信，它能通过快跑式的迅速行动实现其目标，西方并不会以加快脚步来作为回应。在克里米亚，对领土的占领既迅速，又没有流血，而虚弱的乌克兰州国家机关对于俄罗斯的侵略，仅仅是“撕破了脸”而已。问题是，其他原属苏联的国家也同样虚

弱（甚至更弱），尽管它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成功地抵挡住了俄罗斯周期性的禁运，它们也不可能抵挡住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令人担忧的是，选择派遣全副武装、戴着面具的人去占领一个州三分之一的公共建筑坦率地说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因为这被证明不仅简单、而且有效，因此将会具有危险的吸引力。本文由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尼库·波佩斯库撰写。

美菲安全关系的强化将使中美关系疏远 32

导读：美国比以往更加深入地介入到中国与其邻邦在南海的领土争端，这尤其表现在中国与菲律宾的争端上。而且近年来美国对菲律宾的无原则的偏袒加剧了中菲关系的恶化，这是美国战略上的愚蠢行为。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防止与这个崛起的大国爆发冲突是美国在东亚最为重要的利益，南海上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和浅滩并不值得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抗。

不断变化的东亚地区秩序下的日本—东盟关系 34

导读：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一直以来是日本亚太外交和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以及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加强，再加上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同中国有相似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出于共同的战略需要，日本与东盟国家在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上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合作意愿。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日本与东盟加强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呢？

本期智库介绍 36

阻碍 TPP 的真正原因

Daniel R. Pearson /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虽然日美两国在高端贸易磋商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双方仍存在很大分歧，这阻碍了两国的 TPP 谈判进程。本文认为，最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两国各自的政治利益追求。编译如下：

在过去几周，日本和美国进行了一系列高端磋商，试图达成双边协定，以完成涵盖 12 个成员国的 TPP 协议。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甘利明分别在东京和华盛顿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洛曼（Michael Froman），希望在奥巴马访日之前解决各种分歧。有关报告指出，日美双边高端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两国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预计这可能阻碍 4 月 24 日两国总统会晤时突破性进展的达成。

上述阻碍美日双边高端会谈的因素主要在于，日本不愿意废除敏感性农业产品（即牛肉、奶制品、猪肉、大米、糖、小麦）的进口关税，而美国不愿意削减对汽车进口产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以及对轻型卡车进口产品征收的 25% 的高关税。日美两国有充分理由要求对方改变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它们阻碍着竞争优势的发挥，抬高了消费者成本，使有效率的生产者丧失出口产品的机会，从而降低总体经济的福利水平。废除这些贸易抑制措施不仅能使当事国要求对方改变时更有底气，也能促进当事国的经济发生改变。

回顾议案细节，美日两国面临的真实问题是隐藏在贸易政策表象下的政治诉求。日本农民强烈反对减少其通过关税保护而获得的补贴，这一状态已持续了几十年，而且这些农民是安倍自由民主党派一贯的、忠诚的拥护者。如果日本农业政党对安倍政权的不满意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安倍政府铁定会倒台。但是，安倍首相貌似愿意推进农业改革政策，因为他深知改变日本现行农业政策是加入 TPP 协议的关键条件。

美国的政治考虑则与日本有所不同。从理论上讲，美国的汽车产业应该废除对日本进口产品的关税保护。但事实上，一方面，美国对汽车进口产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并不高；另一方面，对轻型卡车征收的 25% 关税的保护效应已明显被日本企业在美国进行的生产设备投资所抵消，一大部分“日本”汽车是在美国组装完成的。然而，美国汽车产业及其工人并不希望削减关税，奥巴马政权无疑也持这一观点。

美国方面，美日谈判陷入僵局的真实原因在于，缺乏将 TPP 协议提交到国会，以寻求直接表决的快速通道（也就是贸易促进权）。如果没有快速解决通道，任何关于 TPP 协议的争议部分即便被提交给国会，也很难解决。坦白地说，尽管快速解决通道已经存在，但是，现有国会要达成 TPP 协议也需要很长时间。

此外，奥巴马民主党派中仍然存在广泛而顽固的势力反对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力的通过。这股反对势力不仅包括有组织的劳动者和左派公民社会组织，还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Harry Reid、议院少数党派领袖 Nancy Pelosi 以及国会中其他党派的同事。尽管奥巴马政权支持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力这一概念，但至今没有出台任何具体立法提案。

奥巴马政府并未暗示其在克服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力所受民主抵抗的进展，眼下，国会成员的争议正好与奥巴马的亚洲之旅不谋而合，这意味着奥巴马政权将失去执政根基。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一个 5 年期间，白宫并未有效地解决此类来自其政治根基核心政党的强烈争议，因此尚无先例可借鉴。他们似乎不太可能找到解决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力矛盾的途径，尤其是这可能会被视为倾向于共和党而非民主党。这一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重要突破可能会被搁置，至少在 2017 年新政权上台之前不会有大的进展。

日本政府无疑密切关注着美国的贸易政治。安倍首相注意到，美国在将 TPP 推向完全贸易自由化方面并不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是，奥巴马总统即将访日，并且日本政府有必要的在这方面有所表示。在美国实施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力之前，日本应该提前废除农业关税吗？当美国谈判者似乎只具有有限的可靠性和影响力，或者近期证据表明，美国的双边 TPP 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真的想就此达成协议吗？如果日本冒险尝试，同意削减关税，要是今年 11 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后，美国却不能做出任何努力，那又将怎样？安倍政府是否会因此陷入困境？

最终结果是，安倍首相似乎会远离其当初对日本农业真正实施的全面改革政策。在看清美国方面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安倍无法将任何条款拿到桌面上。

不幸的是，美国总统这次访问日本期间正逢美国谈判影响力相对较弱的时期。达成协议的压力似乎使美国谈判当局同意日本继续维持明显的农业关税保护政策。未来几年内 TPP 谈判可能无法达成，甚至永远都不能达成。最重要的谈判基础已经丧失了，再次通过贸易谈判实现更大程度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注定将失败。并且，参与 TPP 谈判的另外 11 个国家是否愿意、是否能够等待若干年以期望美国最终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也许应该是如何维持能在未来某个时点达成泛太平洋贸易自由协定的信心。

本文原题为“[What’s Really Impeding Progress in the TPP?](#)”。本文作者为 CATO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刊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凯恩斯主义终于死了

Jamie Parker /文 苏丹/编译

导读：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不再盛行于英国，以及目前宏观政策主要由什么学派主导。编译如下：

大约一年前，当英国经济再次经历低速增长后，对两党联合政府所授权的财政紧缩政策的担忧越来越多。鉴于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2012年在白厅的表现，这是忧郁的一年。同年4月份，他提出的“馅饼税”预算方案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英国3A评级的下调更是给整个经济体笼上了一层阴影。

当财政大臣已经开始将低迷的经济增长归结于较差的天气时，很多人都感受到预算裁减方案真的成为了政府孤注一掷的决策。在这段期间，公众对于经济停滞的担忧和进一步预算削减的警惕，使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转交给了工党内部凯恩斯扩张主义者的手中。事实上，埃德·鲍尔斯（Ed Balls）关于预算削减过快过多的警告以及应当在经济处于低迷时期大幅度刺激扩张的思想正广泛传播。

然而，过去12个月经济表现使得主动权再次易手。最近的数据表明经济体中所有部门都在迅速扩张，并且英国工业和商业联盟也证实英国经济增长已经非常明确并且稳固。这一结论得到了就业人口，特别是全职就业人口快速增长的数据支持。那么紧缩政策是否真正实现了经济复苏目标，以及这种复苏的确如财政部所说的那样是平衡且可持续发展的吗？

作者认为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经济体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平稳增长的阶段。复苏迹象非常确实明显，劳动力市场也表现得非常稳健，并且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目前来看，失业率随时都有下降至7%目标水平之下的可能。此外，通胀率的稳定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逐步上升，都表明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然而，需要警惕的是的确还存在很多影响持续复苏的风险。

第一个担忧来自于平衡增长。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制造业复苏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个长期依赖金融服务发展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能够很好地分散风险。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工业部门的强劲表现事实上来自于非常低的基准额。此外，出口额还远远达不到一般国家的水平。这些都表明英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实质改变，仍然依赖于消费者支出、低利贷款以及伦敦地区的发展。虽然这些方面的持续繁荣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需要警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是，当一国经济过于依赖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的发展时，这一环节稍有差错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目前来看，一个较为简单的解决办法是让金融服务业以及信贷部门去完成最困难的工作，从而让所有可持续和长期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商业投资增加、生产率提高以及出口行业竞争性提高上。

此外，虽然目前来看经济体需求面已经开始复苏，但经济供给面依然还很薄弱。政府在对企业做出长期投资决策承诺上态度始终不明确。然而如果英国希望实现工业复兴的话，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地，如果英国政府希望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也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的话，那么地区之间需要非常好地链接起来，使这些地区可以接受到大量投资。

一些评论者警告认为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程度泡沫。根据他们的看法，房地产价格正在被政府实施的“帮助购买房屋”方案推高，从而加速了外国需求的增加，并导致了严重的供给约束。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一些地区房价的确已经开始逐渐上涨，事实上也存在一定程度投机。然而，仅仅给出资产泡沫或者流动性危机的结论并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随着私人制造企业开始回归危机前的正常水平，新房屋的供给会在市场上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上的不作为正遭到广泛的批评。不考虑任何政治因素，努力工作的英国人民的确正在被不断增加的工具成本、交通成本以及商品价格所压迫。2008年金融危机确实对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人们质疑的是，在六年之后，政府公众支出完全没有增加迹象的同时，为什么银行家们可以继续享受高额的福利。工作的人们越来越觉得纳税人在承担风险，然而私人企业在享受利润。对此，政府应当开始更多地关心公平和道德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乎获得的利润。

公众对于政府干预的评价通常和政府如何征税的态度有关，尤其是针对富有银行家或私人企业拥有者所征收的税的多少。事实上这的确和政党为了建立一个平等和公平社会的执政方向紧密相连。然而，增税需要进一步考虑，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对富人征税可能会促使这些人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或者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投资，从而使得本国的就业机会减少。这对本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从上述很多方面可以看出，仅仅使用二分法的态度来看待财政扩张或者财政紧缩政策并不真正有效，英国政府更需要的是一个折衷主义方案。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需要整治政府傲慢以及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政府有巨大调控空间以使得经济重新走上正轨。

本文原题为“Is Keynesianism finally dead?”。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政治家，新南威尔士州立法会议员。本文于2014年4月28日刊于亚当斯密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市场基金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非肇事者

Peter J. Wallison/文 程覃思/编译

导读：金融危机的出现给全球经济特别是货币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为了挽回紧急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作者认为货币市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是受害者而并非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肇事者。编译如下：

在解决某一政策问题时，对问题本身的误判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应对措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持有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认为资产净值稳定的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在某种程度上对纳税人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是一个威胁。这一错误源于对事实的误判。

出于某种原因，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宣布破产后，美国财政部曾被要求为MMF(货币市场基金)建立一个特殊的保险基金，因为美国的第一储备基金(Reserve Primary)已“跌破了面值”——也就是说，它已经无法赎回其所有股票每股1美元的稳定资产净值。因此，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在下一次MMFs破产时采取同样的措施，而这将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要说财政部建立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MMFs的股东并帮助他们免受损失，这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MMFs股东的利益受损与否和财政部又有什么相关呢？显然，当第一储备基金跌破面值时，它的一些股东损失深重，最终他们的损失介于每股1到2美分。但当时整个金融市场的所有股东都再承受极大的打击，而他们所遭受到损失要远远大于储备基金的股东所遭受的损失。那为什么当其他MMF股东惊恐地将储备基金份额赎回时，财政部却要冒着损害纳税人利益的危险来阻止这些股东将股票转换为现金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财政部也对这件事情表现得惊慌失措。雷曼兄弟的破产让整个市场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其后AIG和财政部以及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拯救市场。随后财政部和美联储推出了一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并从国会那里获得了7000亿美元的基金支持。因此这些行动很可能是财政部在恐慌下作出的反应。

但还有另一个让财政部的所作所为变的更为合理的原因。到2000年代中期，MMF是一项由美国最大银行担保的，表外实体发行的1.3万亿美元的商业票据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些实体，常常被称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管道(ABCP管道)，他们是美联储批准建立的，可以从事黄金投资和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业务。用短期商业票据融资来支持抵押贷款等长期资产的确有利可图，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抵押贷款开始贬值，融资来源将可能无法翻身，那么银行能做些什么呢？

从 2007 年开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随着抵押贷款市场开始减弱，这些商业票据资产担保的资金来源渠道开始枯竭，这要求银行自身能获得更多的资金使资产负债表维持平衡。到了 2008 年初，存量商业票据发行量确实大幅缩小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发行银行开始被迫用自己的资本金来填补亏空。而这一举动大大削弱了银行资本和流动性——这正是在 2008 年 9 月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发生的事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因此被严重削弱。

雷曼兄弟破产的时候，第一储备基金跌破了面值，银行实力被削弱，市场资金短缺，他们无力承担更多的负债以及这些通过表外渠道发行的商业票据。但对银行而言事情似乎更糟。雷曼兄弟破产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非政府 MMF 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像第一储备基金一样，投资者们纷纷把资金从这些基金中撤离，转而投到有政府担保的证券上去了。

这对银行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如果大多数非政府 MMF 遭遇赎回，MMF 将无法为银行销售的商业票据产品提供融资。因此，对于 MMF 而言，确保大规模赎回不会发生对支持银行所担保的流动性商业票据来说至关重要。让 MMF 大部分投资者打消赎回的念头将有助于继续支持短期商业票据这一融资渠道，这样对银行而言压力也会相对减少。

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一些对财政部针对第一储备基金而创建保险基金的指责分散了注意力，让我们无法有效分析财政部设立保险制度的真正原因。然而这些错误的指控使得美国证监会在压力之下改变了的 MMF 的会计准则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 MMF 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本文原题为“Money market funds were a victim, not a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本文作者为 AEI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5 月 2 日刊于 AEI 网站。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和机遇

Gary Gereffi; Xubei Luo/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风险与机遇是伴生体，本文讨论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公司、员工的风险共担机制，以及其在经济升级和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并阐述了政府如何帮助人们管理风险，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受益。编译如下：

1、企业作为风险分散的一种方式

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用于克服市场直接交换中所固有的交易成本而产生的，这些成本包括搜寻、沟通和讨价还价的成本（1937, Coase）。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企业能够比单个家庭直接向市场提供自有产品和服务带来更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多人企业能够在员工之间、企业所有者之间以及员工和企业所有者之间进行风险分散。

- 当风险能在员工之间分散时，一旦某一员工生病，其他的员工可以承担其工作以保持企业正常运行。并且，风险分散机制还可以使得多人企业允许员工进行专业化和共同提高生产效率。
- 当风险能在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分散时，如在有限责任制度下，投资者可以在给定的期望风险水平通过多元化其资产组合而承担更多的创造性风险。
- 当风险在员工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分散时，如通过劳工契约，企业可以给愿意接受更低工资而获得稳定收入的员工提供保险。企业可以通过隔离与生产相关的某些风险而给劳动所有者提供较稳定的工资收入流。为了最大化利润，企业会努力最小化劳动成本，同样地也会最小化其他投入要素的成本。为了最大化其福利，员工不仅希望其收入水平更高，而且更稳定。企业比员工对风险厌恶程度低，更关心的是平均劳动成本，因此可以提供一个低波动性但工资水平较低的劳动合同。利用收入水平及其波动性两个方面，显性或隐性地纳入劳动合同，通过风险分散从而使双方变得更好。

风险分散和多样化鼓励承担风险，并且大范围地提升生产效率。更高的收入使得个人增加储蓄，参与商业保险，增加金融需求，注重营养和健康，进行教育投资获得更多的知识。

然而，随着劳动的分工和企业所有权的多样化，新的风险也开始出现。企业部门对于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影响着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他们雇佣中的风险管理措施。企业可能不负责任地冒破产的风险，给社会制造负的外部性。企业的管理层，常常是拥有特殊管理技能的那部分人，可能与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不同的利益。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以更低的运输和交易成本为特征，企业或者部门之间通过供应链或金融链接，其相互关联性成倍地加强。全球价值链包括两类主要的企业：“领导型企业”和“供应类企业”。“领导型企业”以总部设在发达工业国家的跨国公司(TNCs)为典型代表，他们控制和制定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者和购买者双方包括定价、交付和履行在内的主要市场活动。“供应类企业”在 GVCs 中提供商品和服务，他们一般位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全球价值链（GVC）的“企业部门”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此把彼此共同加入到统一的全球供应链之中。

从 GVC 的观点来看，国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是以领导企业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的供应部分。这具有两层具体的含义：（1）外部参与者（特别是 GVC 领导企业）；（2）国有企业部门嵌套于连接到 GVCs 的更大的区域和全球企业部门。全球企业部门作为特定行业 GVCs，通过在更大范围风险分担的机制而有可能影响人们的风险管理。它有可能不利于或者有害于国有企业部门，并且根据其规模和行业而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2、在全球舞台上的机遇和挑战

企业在全球市场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他们有机会供应较大的全球需求，并且具有更多的升级机会。当然，由于价格、质量和交付安排的国际标准，他们也将面临更高的风险。

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生产集中，从而最小化成本，由此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这也为消费者支付更低的价格提供了可能。这种更高的生产集中将导致大规模集群和集聚效益，同样也给经济带来新的风险。一方面，某一地区的冲击能很容易地传导至网络的其他地方，产生级联效应。如果供应网络是高度相互关联的，在某一部门的低生产率将潜在地影响整个经济，作为下游的部门也将遭受影响。2011 年日本的地震对世界的汽车产业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典型的案例。

虽然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使企业面临新的挑战，但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汇款和移民群体社区可以作为安全网而为个人、家庭和社区分担和应对非系统性的风险冲击。国外直接投资能在危机期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企业业绩的波动性。跨国公司国家之间转移生产的能力将增加波动性，市场的多元化可以使得当地子公司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当东道国遭遇信贷紧缩时，跨国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和来自母公司的投资流也可以降低子公司对东道国信贷条件的依赖性，从而降低其业绩的波动性。对于个人、社区和国家经济，外汇收入的汇款往往比较稳定，并且经常是反周期的。

就 GVCs 而言，由于 2008-2009 年全球经济衰退，GVCs 的规模加速萎缩，供应链“合理化”进程仍在持续。由于经济衰退，作为 GVCs 主要市场的最先进工业国家的消费出现下降，引起 GVC 供应链的规模急剧萎缩。最近的研究强调了

GVCs 在当前时期组成上的新趋势，这改变了国家企业部门所将要面临风险的性质。首先是 GVCs 地理位置变得更加巩固，这反映了 1989 年之后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当前，新兴经济体已经是全球主要的生产中心。其次，GVCs 在组织上更为集中，反映了跨国领先公司 GVCs 寻求全球供应链的“合理化”，其供应商数量已经由 1990 年代的 300-500 家缩减为目前的 25-30 家。

2008 -2009 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强化了在一些 GVCs 已有的趋势，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导入了某些新模式，这影响了国家企业部门的风险分布及其脆弱性。经济危机加速了两个长期的结构性趋势：上述 GVCs 的整合和市场日益转向发展中国家。鉴于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停滞不前，GVCs 供应转向发展中国家的新终端市场。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全球化，国际生产和消费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中心。新兴市场的作用在增加，但由于在 GVCs 定位的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正在上升。这为将来可能的不平等和潜在的危机产生了新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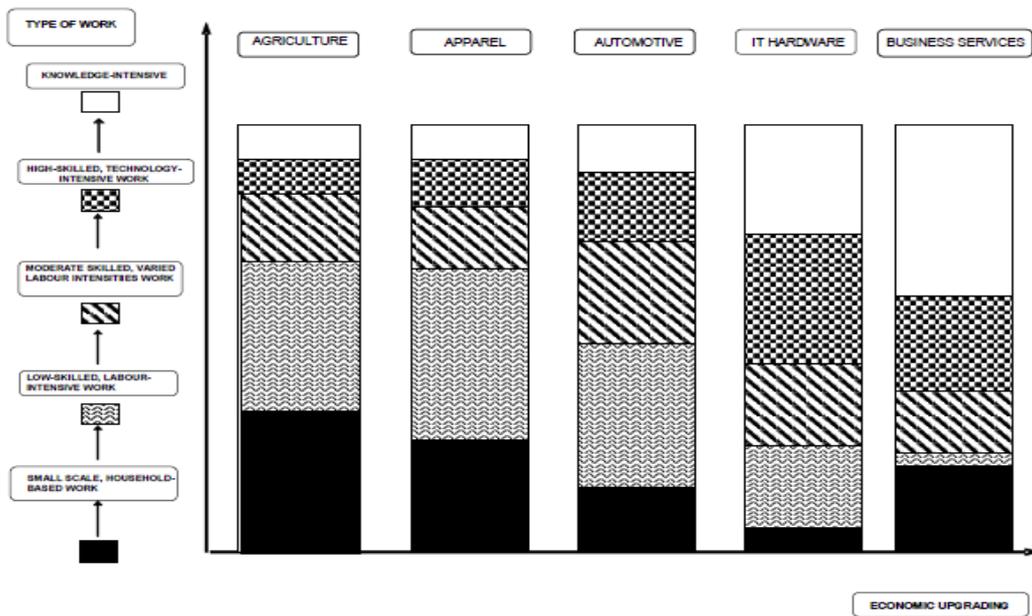
3、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风险和机遇的分布与企业价值链中的定位和价值链的性质密切相关。图 1 说明了价值链命题，分别地，使用了 5 个不同的行业组织。企业、员工的经济和社会升级（或者下降）可以发生于多个轨迹。

图 1 中的每个 GVC 用一个垂直竖井来表示，较低的部分代表了价值链内由低技术类型工人创造的近似份额。所有价值链包括跨越广泛技能水平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例。在最低水平——农场，通常这个价值链涉及相对较大比例小规模的和低技能的劳动力。在价值链更高位置，尤其是在加工、销售的节点，工人的技术水平逐步上升。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四个 GVCs。当活动由低价值向高价值移动时，技能水平逐渐上升；在每个价值链的顶端，开展知识密集型活动高技能工人的比例根据 GVC 的类型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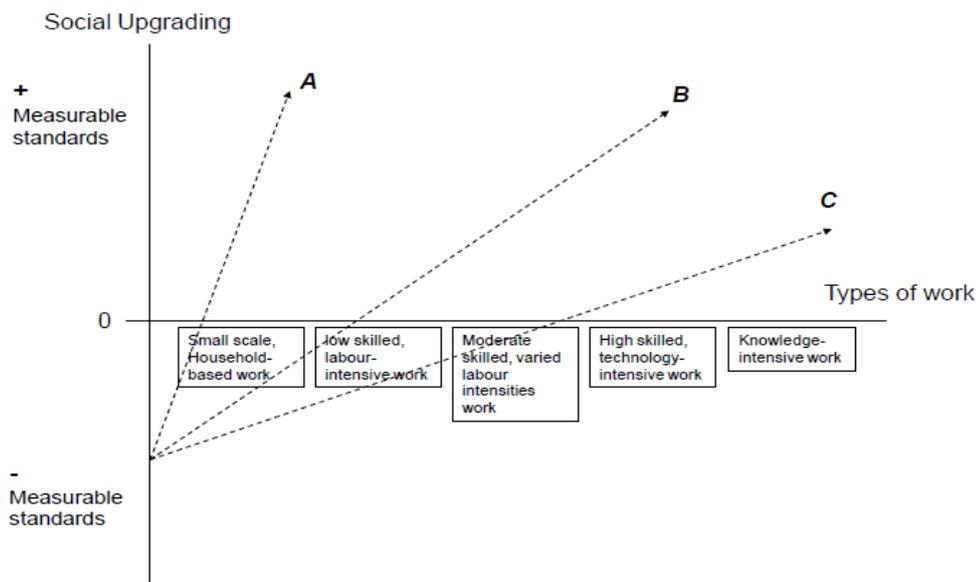
社会升级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而实现，这涉及不同的组合：(a)经济升级，作为企业提升价值链，熟练工人的比例通常增加；(b)引入强制性标准，如最低工资、带薪假期、安全制度和保险。

Figure 1: Industry Groups, GVCs, and Economic Upgrading



可能的另外一种社会升级路径，如图 2 所示的三个案例。第一个例子，路径 A，描绘了一个没有明显经济升级的情形。相反地，沿着路径 C，社会升级将能够发生。在中间路径 B 的情况下，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实现社会升级。

Figure 2: Different Pathways to Social Upgrading



本文原题为“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本文作者 Gary Gereffi 为杜克大学教授，XubeiLuo 为世界银行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刊于 Worldbank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利率自由化

Wei Liao and Sampawende J.-A. Tapsoba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会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从而降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因此，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需要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编译如下：

货币总需求目标的设定依赖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创新和自由化可以改变货币需求、产出和利率的关系，从而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同时降低货币总需求目标的有效性。例如：大量利率衍生产品的出现会提高货币的利率弹性；大量信贷产品和杠杆工具的使用会降低收入的货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只使用直接工具并不能有效地影响实际产出。央行需要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利率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国际经验

我们研究了大量经历过重大金融市场改革的国家，并集中研究金融市场自由化对货币政策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央银行如何对这一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下面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详细说明。

日本：在 1980 年之前，日本金融体制是高度管制的，利率低于市场出清利率水平。经历过 20 世纪 80 年代一系列宏观环境变化（石油价格冲击，公司借贷意愿下降和国内财政恶化）后，日本开始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存款利率自由化、提高金融工具的有效性、去除银行机构和证券公司之间的壁垒。随着利率的自由化，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导致货币政策也随之变化。利率被引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和中介指示指标，日本银行逐渐放开对货币数量的直接控制，转向更多的间接工具——国库券、大额定期存单、商业票据等。

韩国：韩国的金融改革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比日本略晚。改革主要包括银行间市场和商业票据的利率自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私有化；放松对银行信贷的直接控制等。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改变了韩国货币政策的环境。存款准备金的下降以及利率的上升导致货币乘数增加；货币流通速度由于非银行金融活动增加、理财产品增加等而呈下降趋势。因此，韩国的货币政策也开始转向间接调控，并尽力恢复传统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贴现率，准备金制度以及公开市场操作。而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以及利率的市场化，货币—产出—物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

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以丹麦、法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瑞典和美国为样本，使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上述 8 国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影响以及导致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的因素。结果如下：第一，在整个样本区间内，货币需求函数是不稳定的；第二，在金融自由化前后的子序列内，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第三，国内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指标（M3/M2）以及房价会显著影响收入和利率的弹性，也即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发现：在 2002 年第一季度到 2008 年第四季度，中国的 M2—收入—利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2009 年第一季度到 2012 年第三季度也存在协整关系，但整个样本区间内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在 2009 年第一季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也许与 2008 年后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加快，房地产价格飙升有关。

结论

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函数的收入和利率弹性都有显著的影响。对于中国更是如此。2009 年第一季度的结构性断点很可能与金融创新引致的银行表外业务扩张以及非银行金融活动增加有关。上述结果表明：M2 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性指标，其有效性正在不断降低。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持续，央行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利率）。

而且，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会加强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以及利率作为价格工具的适用性。此外，使用由市场来决定的货币政策工具，会大大促进经济的稳定。但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在转变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要发扬“干中学”的精神。

本文原题为“China’s Monetary Policy and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本文作者为 IMF 亚太研究部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重要的不只是增长——金融体系同样关键

Ms. Ramaa Arun Kumar/文 陈博/编译

导读：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金融市场上违约数量增多使得不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担忧。作者详细探讨了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信贷错配问题，并对大量项目薄弱的财务基础表示担忧。最后，作者提出了简单的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中国的决策者现在必须认识到世上从来没有无风险的投资。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所遭遇的起伏波动表明，比起高增长率来说，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是一个更值得当前关注的问题。近来中国日益增多的违约企业数量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酝酿着一定的危险。

2014年1月，上海超日太阳能企业无法支付利息，而监管者拒绝对此伸出援手，表明了银行体系不会分担企业的损失。违约的总金额为8980万。尽管这和中国企业债市场1.4万亿美元的总额相比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这样的违约使得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该市场的风险因素。此前，投资者狂热地追逐着那些没有担保品的债券，而且甚少考虑他们的安全性。

另外一项违约发生在房地产市场。浙江兴润房地产公司无法支付总额约35亿人民币的欠款，而公司的资产总额仅有30亿人民币。债权人中包括了15家国内银行以及一些个人投资者。

无论这些违约是否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中国计划型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带来正面影响，都有待观察。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深度探究为什么这些企业会发生违约。

信贷错配

信贷错配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银行体系的一个问题。廉价的贷款使得经济体对于信贷的需求迅猛增长。由于政府人为压低存款利率，并且将贷款的基准利率维持在6%，银行能够以低价获得资金并且赚取巨额的存贷差，同时企业借贷者也能够获得廉价的贷款。因此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长期以来为负，而借款利率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低。

或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廉价的贷款会成为一个问题。这难道不会鼓励企业投资并带来更快速的财富增长吗？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旦投资的回报率不足以偿还资金的成本，那么经济就会失衡，资金使用也就变得低效。

在中国，多重因素导致了信贷资本的错配。Michael Pettis指出其中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

- 不完善的问责制度
- 严重扭曲的价格

- 将投资的收益集中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和较短的期限内，却将成本分散给全国的银行体系并且将债务偿还周期大幅拉长
- 预算约束缺失或不足
- 地域和条块割裂
- 激励失当。成功完成投资任务的人往往获得升迁，却忽视了投资的负面的效果。

投资的热潮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飙升。债务增长速度超过了资产的升值速度。一旦这些资产不能带来现金流，就会导致资不抵债，并且从长期来看为金融体系带来难以承受负担。

产业政策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政府引导的产业支持计划。这和信贷错配紧密相连。政府一直在引导资金进入几个产业，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所谓的绿色能源产业，比如太阳能、电力汽车。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不少产业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

绿色能源产业

国际能源机构预计太阳能在全球的发电占比将从现在的 0.15% 翻十倍，在 2020 年增长至 1.18%。中国计划在 2013-15 年间增加 10GW 的太阳能发电量，使得 2015 年末的总装机量达到 35GW。然而 2012 年末这一数字只有 5GW。因此中国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补贴和财政刺激来驱使产商达到这一生产目标。中国的国开行自 2013 年底新增了将近 75.7 亿人民币的贷款，用于支持这一产业。国开行已经总计为太阳能、风能和其他清洁能源提供了 688 亿美元的贷款。

然而，需求端的波动使不少太阳能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变得很低。2011 年和 2012 年出口下降以及产能过剩使得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下跌了将近 60%。两年内行业内主要的企业遭受了将近 28.5 亿美元的损失。在电动车方面，中国设立了 1 千亿人民币的基金用于扶持该产业。但是需求端不振或许会使这项投资走向失败。深圳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销售量持续下降促使政府重新考虑该基金的作用。

房地产和基建

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曾经提供了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大部分的资金流向了基础建设和房地产行业。尽管该刺激计划促进了基建行业的发展，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不少项目的财务基础极为薄弱。虽然资金丰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几年内兴建了大量住宅，但是房地产价格仍然在大量需求的助推下飙升。这使得不少中国居民无法承担房屋开支，导致了房屋空置率高企。不少城市的“鬼城”就是最好的证明。

影子银行

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导致了影子银行的兴起。影子银行体系由典当行、信托公司、理财产品和信用担保公司等机构构成。这一体系不从公众那里吸收存款，也因此隐藏在监管者的视线范围之外。根据美林美银的预测，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达到了 14.5 万亿人民币，接近银行贷款规模的 25%。

尽管发展速度极快，但这一体系的基础却十分薄弱。经济增速下滑更导致了形势恶化。2014 年初，一家山西煤矿企业无法偿付 30 亿人民币的影子银行产品。最终山西省政府、工商银行和信托公司共同分担了损失。

对策：金融改革

在违约数量增多的背景下，金融政策应该变得更加市场化。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也提出了相应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提升宏观金融管理水平等。中国有必要降低信贷增长速度，从而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改变过去高信贷驱动型经济增长。此前的金融体系为国企和大企业提供大量的廉价贷款，并且让银行赚取巨大的差价。这其中信贷错配带来的损失十分巨大。改革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通过允许企业违约，中国政府向银行体系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自己不会为银行错误的决策买单。但仅仅是提升整个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是长远之计。更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监管体系，查漏补缺。

金融稳定性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发展完善的银行体系和债券市场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并且能反过来加快改革的进程。同时，放松资本账户监管、培育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前海和自贸区等在岸金融特区也都是有效的手段。良好的资本分配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有助于提升全球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本文原题为“[It is Not Just About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inances Matter](#)”，本文作者为 RIS(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刊于 R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民币国际化——访巴里·艾肯格林

CIGI 访谈/文 李想/编译

导读：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引发了国际化动机、金融改革、信贷及国际金融稳定一系列相关问题。为更好地理解这些领域的情况，CIGI 高级研究员王宏英（音译）专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 and 经济学教授、NBER 研究员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编译如下：

CIGI: 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政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Barry Eichengreen: 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着风险和成本，其动机有多种，但是将其归因于“中国政府”可能是危险和误导性的。关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不同机构持有不同看法。有人将人民币国际化看做增强中国银行和企业竞争力的一种途径；有人认为其目的是减轻中国对美元的依赖；另有一些人则将其视作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及相关改革（如更为灵活的汇率、银行完全商业化、监管强化等等）施加压力的一种机制。其背后的动机绝不是单一的。

CIGI: 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在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货币互换。您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下一阶段是什么？

Eichengreen: 下一阶段可能包含拓宽和深化近期的举措（扩大外国人在中国以及中国人在海外可参与的金融交易范围），允许在各大国外金融中心（如伦敦）成立清算银行，并在上海成立（或至少准备成立）自由贸易和金融区。

CIGI: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如果不先进行中国国内的金融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会给中国带去很大风险，但是国内金融改革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阻碍。您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定者真的愿意，并且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吗？

Eichengreen: 中国官员可能会像其他领域的改革推进进程一样，缓慢而渐进地（摸着石头过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中国将继续沿着那个方向逐步前进，每个时间段放松并解除一些限制。问题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某个时点对这一过程丧失控制，套利的后果就是资本账户比预想更快地自发开放。这才是风险所在。

CIGI: 信用对于一国进行货币国际化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要如何建立这样的可信性呢？

Eichengreen: 中国正尝试改革金融监管制度，使得金融市场的漏洞更为透明。并尝试将影子银行纳入可监管范围。这意味着没有什么大型金融企业或债券发行人是能够实现大而不倒的。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的效力是否充分。中国必须加强合

同执行力度并强化法制，以获得国际投资者的全面信任。值得怀疑的是，这或许需要在政治、经济和金融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CIGI: 有人曾担忧中国可能使用“货币威力”来赢取政治影响力。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否构成威胁？

Eichengreen: 我认为“货币威力”被低估了。中国可能通过有选择性地提供紧急流动性来奖励朋友并惩罚近邻。但如果对于很大范围的一些国家而言，在危机时期提供紧急流动性不是免费的，人民币国际化将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中国推进其进程的努力也将被打折扣。

CIGI: 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人民币的贸易力度，国际社会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您认为人民币是否相比欧元和日元更能挑战美元的支配地位呢？

Eichengreen: 中国的经济规模确实有利于其货币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并且中国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是只有国别货币自身稳定，并且市场流动性较高时，其作为国际货币才具有吸引力。建立流动的市场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实现这一条件所需要的远远不止巨大的经济规模。所以人民币想要在全球舞台上与美元甚至欧元比肩，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IGI: 人民币国际化是否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呢？

Eichengreen: 当前全球流动性的充分供给是主要目标，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当然是件好事。美国已经不能继续独自为一个愈渐扩张的世界经济提供安全和流动性充足的资产。美国财政能力有限，随着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其能力将更受限制。其他大型经济体应该站出来充当流动性的供给者，显然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

来自中国的竞争也将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加强自我约束提供建设性资源。如果其他国家可以为了流动性需求投靠中国而非美国，美国政策制定者将感到更多压力，从而将更规范自己的行为。反过来，这也将对世界经济和货币及金融体系起到稳定作用。

本文原题为“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本文作者 Hongying Wang 为 CIGI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刊于 CIGI 网站。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14 年年底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

Derek M. Scissors / 文 孔莹晖 / 编译

导读：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数据显示，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将于 2014 年年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作者认为，GDP 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国民财富才是衡量经济规模的合适指标。而中美财富总额仍有很大的差距，短期内中国不可能超越美国。编译如下：

4 月 30 日，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ICP）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购买力平价指数比 2005 年提高了 20%。这意味着中国将于 2014 年年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比 IMF 此前预测的提前了五年。

ICP 的说法值得商榷。比较任意两国用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 GDP 在任何时期都是没有意义的。

购买力平价是为了更好地衡量个人收入。500 美元的年收入在孟加拉国是相当低的，但比起在澳大利亚能购买更多的东西。首先，我们需要比较孟加拉国和澳大利亚所有地区的购买力，然后根据两国商品和服务的差异进行调整。这项工作并不简单，而对于大国来说就更加困难了。纽约与路易斯安那州的平均价格水平和上海与西藏的平均价格水平能够比较吗？没人会相信吧。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PPP 是用来衡量购买力的，而不是经济体量。孟加拉国的商品与服务价格比澳大利亚便宜并不表明孟加拉国的经济体量相对变大了。GDP 包括私人消费、政府消费、投资与贸易，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是私人消费数据，用购买力平价计算 GDP 其他分项并不合适。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都高于美国，但两国之间仍存在差距。2011 年，两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相差 2 万亿美元；2013 年，两国标准 GDP 相差 7 万亿美元。

GDP 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产出，而不是其经济规模。GDP 每年都会归零重算，但经济规模不会，产出不会消失。因此，国民财富才是衡量经济规模的合适指标。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估算，2013 年年中，中国的私人财富总额为 22 万亿美元，而美国为 72 万亿美元。虽然私人财富不能说明一切，但 50 万亿美元的差距使得“中国超越美国”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我们再用其他数据进行验证。美联储估算，2013 年底，美国私人财富总额为 80 万亿美元，扣除公共债务后，美国财富总额约为 65~70 万亿美元。中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也负债累累，其净财富很难估算，应该不超过 10 万亿美元。如此计算，中国财富总额约为 30~35 万亿美元，比美国少 35 万亿美元。在过去三年中，中美的财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因为美国走出了经济危

机，而中国企业大举借债。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超越美国，甚至永远都不会超越美国。

本文原题为“Will China's economy be #1 by Dec. 31? (And does it matter?)”。Derek M. Scissors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本文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刊于 AE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房价下跌对中国银行业影响几何？

Nicholas Borst /文 刘洁/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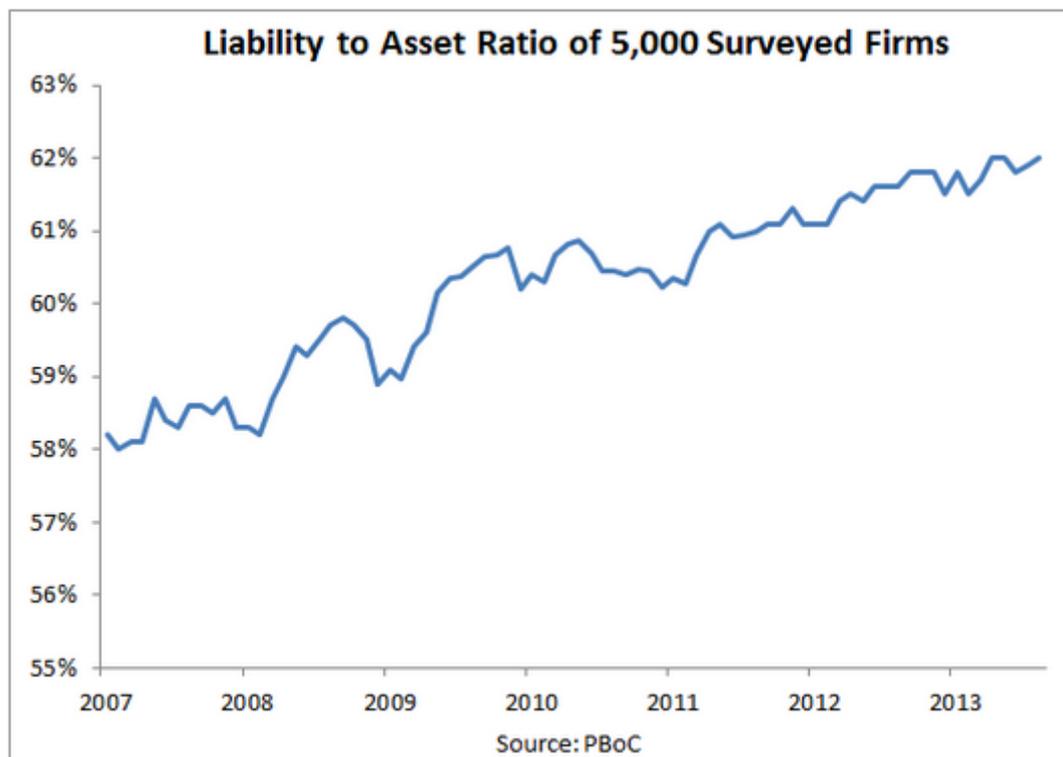
导读：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会造成大量房产开发商违约，然而其危害并不局限于此：一方面房价下跌会导致企业以房产为抵押品的借款能力降低，影响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房价下跌会导致居民财产贬值，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投资与消费的降低又会影响整体经济，导致更多违约产生。编译如下：

中国现正经历一轮新的银行压力测试，而房地产价格下跌定会成为测试变量之一。之前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压力测试均低估了房地产价格下跌对银行业的风险。例如，近期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一篇报告就预估：房地产价格下降幅度在30%以内几乎不会对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NPL）产生影响。甚至房产价格下跌40%—50%也仅仅会使不良贷款率增加3.8-5.6个百分点。

目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如果我们取房产价格的最大跌幅，即房产价格下跌50%将带来6.6%的不良贷款率。我们试想下这一情景。2007年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6.6%。三年前也就是2004年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该值的两倍还多。这就说明即使房产价格下跌50%，中国银行业还能像2000年代中期一样保持相对正常的运行。

乍一看上述结论似乎是讲得通的。房地产贷款占交通银行全部贷款的20%。房地产价格的迅速调整将使其中一些贷款陷入违约状况。大量违约贷款很可能来源于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而不是来源于家户。这将对银行体系产生冲击，不过由于具有高水平的资本缓冲，这种风险是可控的。

然而，如果历史具有先见性，事情将会更为复杂。首先，一些为房地产发展作大量投入的行业，如钢铁、大型家电、水泥等行业，将会随着家具建材市场价格的下跌而突然陷入衰退状况。这毫无疑问会使很多边缘产业陷入财务困境。由于过去几年企业的杠杆率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这一问题就更值得关注。



因房地产在投资与消费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其价格下跌的冲击甚至会波及房地产和相关部门以外的其他行业。房地产对投资的作用是通过抵押贷款实现的。超过 40% 的银行贷款是以房屋作抵押的。这就意味着房地产价格的任何调整都将对银行所有的抵押品价值造成负面冲击。

根据中国的五级贷款风险分类办法，抵押品价值下降就要求银行增加准备金提取，从而降低其放贷能力。更糟糕的是，很多企业严重依赖以房产作抵押借款。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下跌将不利于其获得新贷款，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间接渠道。这反过来会降低企业投资并影响整个经济。

对于上述问题，历史给予我们什么经验？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同样经历过房地产大繁荣的时代。与中国一样的是，当时日本的大繁荣时代也是主要源于国内融资，并且由于首付比例较高（自筹资金平均有 40%），家户杠杆率相对也较低。日本与中国一样拥有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中土地是重要的抵押品。当土地价格大跌 50% 时，企业运用房地产作抵押进行负债的能力也大幅削弱了。这导致这些企业的投资下降，损害了日本的整个经济。

中国的企业负债水平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150%，这种由房地产价格调整对投资造成的层层推进的负面冲击将成为中国的一大风险。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说更是如此，原因在于其过分依赖以土地作抵押品。土地价格的急剧变化将有损其为新的基础设施工程融资的能力，而这正是经济增长的一大重要驱动力。



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还会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低杠杆水平意味着家户不愿远离其购买的房产。然而，由于储蓄者意识到其投资价值已比预期少太多了，这就产生较大的财富效应。这一问题在中国尤为严重，有以下两个相关的原因：首先，相当数量的房产是用于投资目的。估计 2012 年上半年因投资目的而购买的房产数量占比超过了 50%。第二，中国家庭财产的很大比例是以房产形式存在的，超过 40%（美国的这一比例是接近 30%）。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幅度与交通银行压力测试中预估的一致，这会对中国家庭的净资产造成负面冲击，他们无疑会削减消费。

上述观点并不表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即将崩溃。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越来越富强，有很多原因可以证明对新房产的需求仍将坚挺，尽管这一需求或许不及近些年了。不过，房地产价格调整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房地产开发商违约增加和抵押贷款止赎。房地产需求支撑着大量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作为一种资产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借款时为抵押品，并且对家户来说是一种投资品。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下跌会造成投资与消费收缩，这会损害经济，并反之以更多违约的形式对金融体系造成极大伤害。中国并没有卷入美国式的止赎浪潮，但金融部门显然不能幸免于房地产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影响。

本文原题为“[How Vulnerable are Chinese to a Real Estate Downturn?](#)”，作者 Nicholas Borst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民币仍被低估吗？

——来自新购买力平价估计的反驳

Martin Kessler 和 Arvind Subramanian/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本文基于国际物价比较（ICP）项目 2011 年的数据，采用两种模型估算了人民币的被低估程度，结果出乎意料：2014 年人民币已不再被低估。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即将结束。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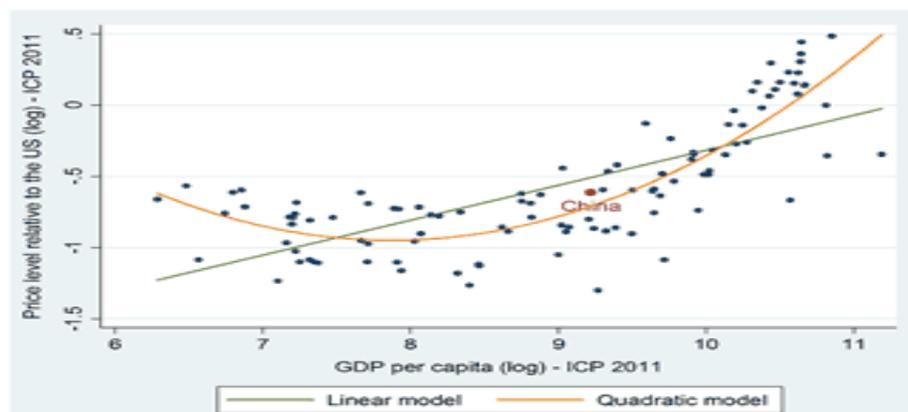
4 月 30 日，世界银行公布了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最新的购买力平价（PPP）估计。该项估计以国际物价比较（ICP）项目在全球进行的物价调查为基础，每 5-6 年公布一次，最新的调查近至 2011 年，上一次调查在 2005 年。新数据为重温如下长期性全球政策问题提供了机会：人民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低估了？

我们的研究结果令人惊讶：或许人民币根本没被低估。2005 年，人民币尚被低估了近 30%，但此后便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人民币的估价相当公正。这一转变可能预示着：近二十年来，中国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价格、增加出口实现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即将结束。

Cline（2013）和 Gagnon（2012）使用 PPP 估计量估算货币的低估/高估程度，并将此方法同基于其他宏观指标估计的方法进行比较，Subramanian（2010）对他们的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本文仅展示基于 PPP 方法推导出的结果。

PPP 方法的基本思想在于，认为物价与人均收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穷国的不可贸易品和服务部门通常价格更低，因而总体物价水平更低，这促使资源流向可贸易部门：低物价水平反映了汇率的贬值。这一关系十分稳定，足以提供一个基准情形：给定收入水平，我们可以推断其所应有的物价水平，进而推断均衡汇率。若一国物价低于该水平，则表明其货币被低估了，反之则被高估。

图 1 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



注：一国若低于（高于）任一条线，则其汇率被低估（高估）。

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方法来估计这一基准情形：方法一为线性回归，即物价水平为人均 GDP 的线性函数；方法二采用二次函数，考虑了一项事实，即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在穷国中很弱（因而处于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在新兴市场中较稳健（处于向上倾斜的部分）。上图阐释了这两个模型。

我们用两个不同的样本估计这一关系。假设对“正确的”样本或模型不可知，我们采用这四种估计方法的均值来表示主要结果（2 个模型与 2 个样本的组合）。考虑到此类估计方法内在的误差范围，我们的分析主要为把握大趋势提供参考，而不拘于精确的数字。

我们发现，2011 年，人民币仅被稍稍低估了——约 1.7%，如果愿意相信二次函数模型的话，人民币甚至可能被高估了（参见下表）。

表 1 对人民币的研究结果

Benchmark years	GDP per capita (in PPP dollars)	Linear model		Quadratic model		Average undervaluation (percent)
		Sample 1 (percent)	Sample 2 (percent)	Sample 1 (percent)	Sample 2 (percent)	
2005	4,802	-34.5	-35.0	-23.9	-19.4	-28.2
2011	10,057	-9.7	-9.8	2.7	10.0	-1.7

对于 2005 年，使用相同方法估计，人民币的平均低估程度约为 28%。这表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矫正——2005 年时占 GDP 的 6%，此后逐渐上升，于 2007 年达到峰值 10.1%，之后下落到 2011 年的 1.9%——确实伴随着约 27 点的实际升值（相对基准情形而言）。

ICP 数据仅更新至 2011 年。然而，我们可以使用 2011 年的数据，并估计 2014 年的人民币均衡价格。2011 年至 2014 年 3 月末，中国人均 GDP 增长约 13 个百分点，增速高于美国，导致人民币约 3.2% 的升值。据国际清算银行（BIS）估计，同期人民币实际升值约 7%。这暗示着，自 2011 年起，人民币 1.7% 的平均低估水平已通过升值（高于中国 GDP 增长所需的水平）被有效地消除了。2014 年的人民币得到了公正的估价。

这一估计具有潜在的历史重要性。假定中国不逆转其汇率政策，若继续采用目前正在使用的手段——大规模干预、设计人民币贬值，则将落后于其所倡导的发展策略，后者要求将货币维持在低廉的水平上，以刺激出口。本文基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完成的估计，其重要性在于：不仅广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如经常账户赤字）正以合理的方式变动，潜在相对物价似乎也正以一种阻止资源流向出口部门

的方式变动，这使中国的再平衡策略得以继续。换个说法，谨慎乐观的态度是有理由的：不平衡将不会出现，因为基本面正得到优化。

中国重商主义的尾声——也是其他国家的慰藉——或许在望。

本文原题名为“Is the Renminbi Still Undervalued? Not According to New PPP Estimates”。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5 月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克里米亚之后：普京的资产负债表

Nicu Popescu/文 李骁/编译

导读：俄罗斯外交擅于“快跑”，西方尤其是欧盟外长擅于长跑。莫斯科对于机动军事力量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在乌克兰的其他长远外交政策是失败的。俄罗斯基于“大棒”（禁运和制裁）和“胡萝卜”（提供廉价的天然气和更大的市场准入）的强势外交，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莫斯科相信，它能够通过快跑式的迅速行动实现其目标，西方并不会以加快脚步来作为回应。在克里米亚，对领土的占领既迅速，又没有流血，而虚弱的乌克兰州国家机关对于俄罗斯的侵略，仅仅是“撕破了脸”而已。问题是，其他原属苏联的国家也同样虚弱（甚至更弱），尽管它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成功地抵挡住了俄罗斯周期性的禁运，它们也不可能抵挡住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令人担忧的是，选择派遣全副武装、戴着面具的人去占领一个州三分之一的公共建筑坦率地说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因为这被证明不仅简单、而且有效，因此将会具有危险的吸引力。本文由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尼库·波佩斯库撰写。编译如下：

国内获益

到目前为止，在乌克兰的军事干涉使普京得到了客观的回报——至少对（俄罗斯）国内来说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人坚定地认可对于克里米亚的合并：根据独立的列瓦达中心的数据，88%的俄罗斯人支持合并（只有7%的人反对）。其结果是，普京的民意支持再次飙升。夺取克里米亚还产生了一个效果，即在总统身后团结了更多的人，并且分化了反对者。由于支持率（总人口的50%—60%）较高，普京成功地聚合起俄罗斯政治光谱中的极左和极右势力，包括民族主义者、共产党和那些痛惜苏联解体的人。在2011—2012年冬季的沼泽广场抗议中，一个关键的动因就是反普京者大联盟的出现。现在，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支持他，而自由主义的少数派则被普京贴上了“第五纵队”或“卖国贼”的标签——这个词在1930年代被广泛使用。

危机的烟幕也使俄罗斯能够取缔（与官方）意见相左的独立媒体。Rain电视台在被几家有线电视运营商关闭了其网络外站点之后遭受了严重打击，导致了收视人数和广告收益的骤降。最有名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家中被捕，其博客也被关闭。在检察长的要求下，几家独立的网站（ej.ru、grani.ru和kasparov.ru）由于它们“参加非法活动和大规模抗议”被拉进了网络提供商的黑名单。Lenta.ru，俄罗斯最流行的新闻网站的自由派主管被赶走。商业日报也换了主管，且由于其记者坚持对乌克兰的事态发展发表了一定程度上较为独立的社论，其乌克兰分支机构被关闭。但是伴随着乌克兰危机占据了国际国内的电视屏幕，这些事件都被大大忽视了。

国际成本

从经济上来说，克里米亚的军事冒险明显带来了重大的成本。俄罗斯每年需要花数十亿元来资助克里米亚。直到最近，克里米亚三分之二的预算仍由基辅的

中央政府来提供：这一财政负担将会落在莫斯科头上。俄罗斯还必须提高工资和养老金，并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建一座连接刻赤海峡的大桥。克里米亚的旅游业（在非正式经济中带来了收入，但却很少交税）遭到了重创，因为来此参观的 70% 的游客来自乌克兰其他地区。另一方面，这些成本中的一些将由占领乌克兰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备区（位于克里米亚领海）和取消对乌天然气优惠来抵偿。作为交换，部分包袱被甩给了基辅，因为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估计这笔费用每年约 20 亿欧元。

西方的制裁（更多的是威胁）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已导致俄罗斯近 500 亿欧元的资本流失，这比（俄罗斯）2013 年全部的资本净流出还要多。更为甚者，当流入的钱变少，证券投资者正在撤资。大多数俄罗斯公司也受到影响：建立信用、融资、发行债券以及成为西方公司的合作伙伴都变得更加昂贵。

这些不利影响将会打击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在 2013 年，俄罗斯经济基本停滞（仅增长 1.2%），2014 年的预期甚至更糟。一个预示未来麻烦的标志是，卢布从本年度一开始就不被看好，甚至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就这样。

然而，普京会像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像一个会计师那样去思考。在俄罗斯总统看来，对于保持权力的广泛政治考量而言，经济是次要的。从这一点来说，保持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内和地区）俄罗斯的形象只相当于损失了很少一笔钱。此外，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有其根源——不作为、腐败，改革缺失——现在可以被西方诟病，可能导致（俄罗斯人）更加“团结在旗帜下”的后果。因此当普京并不打算从经济事务中获取多少东西的时候，当前的外交冲突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即将到来的经济困难的可能借口。

谈到外交政策成本，俄罗斯发现它自己“悬浮”在八国集团之外，正在与欧盟进行的关于免签旅行的谈判也被搁置。这将使追求在欧盟建设天然气管道的政策更加困难，南溪成为一个被遗留的问题。在安全问题上，北约和美国将会在中欧更加活跃。最终，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即使是对俄友好的那些国家，也可能开始更加敌视俄罗斯，即便尽可能地默不作声。

未来的估计

尽管这些成本没有重要到足以超过（俄罗斯）从最近的危机中获得的利益，克里姆林宫仍要确保坚强的俄罗斯能经受住政治暴风雨的考验。从国内来看，普京更大胆了：它现在可以在国际外交成本之下生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相信大多数外交制裁都将会很快结束，而不是持续更久。他的亿万富翁朋友们挣的钱可能会少一些，但仍是亿万富翁。

俄罗斯从西方反应的细微差别，以及世界上绝大部分，包括俄罗斯的金砖伙伴，在（俄罗斯）通过军事手段改变边界问题上保持大体中立的姿态这一事实中

寻求安慰。即使其他前苏联国家对俄罗斯的信任越来越少，它们也更惧怕俄罗斯，因此可能更加配合俄罗斯诸如欧亚联盟这样的计划。甚至俄罗斯“失去”了乌克兰这一观点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俄罗斯曾军事干预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发展出一个强硬的反俄社会共识，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乌克兰解决问题。普京的成本—收益分析给欧洲安全造成了真正的危险。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或是所谓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哈萨克斯坦的更多干涉可能不会像它们几周前所做的那样牵强附会。西方不必开始快跑，但可能得迈开马拉松的脚步了。

本文原题为“After Crimea: Putin’s balance sheet”。本文作者尼库·波佩斯库 (Nicu Popescu) 为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 (EUISS) 资深分析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刊于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网站。[点击此处可查看原文。](#)

美菲安全关系的强化将使中美关系疏远

Ted Galen Carpenter/文 杜哲元/编译

导读：美国比以往更加深入地介入到中国与其邻邦在南海的领土争端，这尤其表现在中国与菲律宾的争端上。而且近年来美国对菲律宾的无原则的偏袒加剧了中菲关系的恶化，这是美国战略上的愚蠢行为。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防止与这个崛起的大国爆发冲突是美国在东亚最为重要的利益，南海上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和浅滩并不值得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抗。现编译如下：

美国比以往更加深入地介入到中国与其邻邦在南海的领土争端，这尤其表现在中国与菲律宾的争端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 2013 年八月访问菲律宾时曾宣布美菲同盟关系乃是地区和平与稳定之锚。在本月上旬，美国和菲律宾又达成了一项新的安全协定，该协定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基地来从事海上活动。

除了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的基地，这项新协定定然也会推动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美国已经在 2014 年的援助预算中给菲律宾拨了 5 千万美元，这笔数目竟是前些年两倍多。而且美国海军在菲律宾及其周围的活动次数已经迅速上升。据路透社的报道，相比 2012 年，美国军舰对菲律宾的 68 次访问，2013 年这个次数已经上升到了 149 次。尽管菲律宾的领导人继续坚持声称新的安全协定不包括美军的永久驻扎，但是如此频繁的军舰访问已经使事实和“永久性驻扎”没有太大的区别。

尽管美菲官方没有公开承认这种日益强化的安全关系是针对中国的，然而这却是不言而喻的。路透社记者曼努埃尔明确写道：该协定将提高防范中国的安保等级，而且美国已经在南海争议区域加强了它的海军存在。

这种趋势以及它针对中国的性质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事实上，自菲律宾参议院在 1991 年 11 月投票把美军从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驱逐之后不久，美国就已经开始尝试在该地重建其强大的军事存在。美国的第一步行动在 2000 年得以完成——与菲律宾达成一项允许美军帮助训练菲律宾军队的协议，该协议表面上旨在反恐。从这之后华盛顿便抓住一切机会来强调它与马尼拉双边协定的重要性。在 2011 年巴厘岛经济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格外强调美国对美菲同盟的忠诚，并且保证要加强双边关系。而中国官方对他的表态持以不安的态度。在此之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又立即发表了在南海问题上大力支持菲律宾的声明。

近年来美国对菲律宾的无原则的偏袒加剧了中菲关系的恶化。在 2012 年春天，当菲律宾把几艘舰船部署在黄岩岛周围以强化其话语权之后，中菲之间的紧张局势便爆发了。北京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逐渐派出大量的渔船和海军巡逻舰前往该海域并最终取得了该岛屿的控制权。当时的《中国日报》社论指责菲律宾

在南海执迷于充当麻烦制造者这一角色。在最近的一节评论中，该社论补充道：此次事件显示菲律宾决意要拉美国卷入它与中国的争端中。由于单方面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马尼拉不仅忽视了中国释放出的善意，而且还力图把问题复杂化。最近的一场冲突高潮开始于今年年初，在北京的强烈反对下，菲律宾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南海上岛屿的归属权诉诸了国际仲裁，目前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之中。中国官方对于菲律宾的这些伎俩表现的颇为愤怒，由此又使冲突继续升级。在三月份，中国海军建立了一个海上封锁以阻止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浅滩驻军进行补给和增兵，这个浅滩是南海中的另一个争议岛屿。

华盛顿业已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习惯——在安全上支持那些脆弱且不可预期的小国。把俄罗斯边境上的那些小国纳入到北约集团就是这种不明智的战略行为的一个例子，这种战略行为使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支持菲律宾与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对峙也是这种鲁莽的战略行为的一个例子，而这将很有可能导致悲剧性事件的发生。

美国在南海确实是有些重要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航行自由。但是，这只是美国在东亚整体利益的一个方面。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防止与这个崛起大国爆发冲突才是最为重要的利益，以上无人居住的岛屿和浅滩的价值并不值得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抗。然而，华盛顿却在扩大它与菲律宾的安全关系，并在中菲日益紧张的对峙中积极支持菲律宾。很显然，美国领导人迫切需要重新考虑他们所采取的相关政策了。

本文原题为“Washington’s Growing Security Ties with Manila Risk Alienating China”。本文作者泰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为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4月28日发表于中美关系焦点（China-US Focus）。[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不断变化的东亚地区秩序下的日本—东盟关系

Mie Oba /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一直以来是日本亚太外交和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以及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加强，再加上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同中国有相似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出于共同的战略需要，日本与东盟国家在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上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合作意愿。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日本与东盟加强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呢？现编译如下：

去年十二月，为纪念日本—东盟关系 40 周年，一个特殊的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在本次会议上通过了几个声明，其中包括了“东盟—日本友好合作愿景声明”。在这个愿景声明中列出了一些日本和东盟应该寻求合作的领域，同时那些标题为“和平与稳定的合作伙伴”的议题也高居榜首。日本与东盟的合作此前一直集中在经济和社会问题领域。

1977 年“福田主义”强调互信的重要性，并主张“心连心”的伙伴关系。此次会议的愿景声明也包含了社会经济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内容，“走向繁荣的合作伙伴”，“走向高品质生活的伙伴”和“坦诚相待的伙伴”这些标题表明它们仍然是日本—东盟合作的重要议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和东盟将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放在第一位，本次会议特别强调了它的重要性。这也是在 2011 日本东盟首脑会议通过“巴厘宣言”的重要特点，所以远景声明强调了这一趋势。

在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中给予政治和安全合作更多的权重，表明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在最近几年的东亚地区秩序变迁的背景下具有更重大的战略意义。其中一个变化是中国的持续崛起，特别是其日益增长的不透明性和由于自 2000 年年底以来，中国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中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给区域内国际的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中国在南海与菲律宾、越南以及其他东盟国家有领土争端，中国的强硬立场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虽然从去年 9 月开始，各方努力起草南海“行为准则”，但进展缓慢。同时，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紧张对峙以及在对待历史问题的不同态度也使双边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

此外，美国的政治影响，对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期望似乎正在消退，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由于国内政治动荡震，奥巴马总统缺席了 2013 年 10 月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盟会议，动摇了对政府先前提出的“再平衡”政策的信心。这种疑虑已经开始显现，尤其是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由于叙利亚和其它地方的紧迫性不断增加，美国对东亚的兴趣不断减弱。很明显，美国可以合理分配以确保东亚地区稳定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意识到原始的“权利”逻辑正逐步成为左右地区局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政治和安全事务将在未来的日本与东盟合作中处于中心地位。日本和东盟应该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是海上安全合作，包括协助加强东盟国家保卫沿海安全的能力。进一步来说，需要协调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警务工作方面的努力。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为了保持本地区的稳定也需要加强确保法治，善治，民主和人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

这个方向已经在愿景声明中已经表现出来。然而，因为中国很可能将日本与东盟的紧密合作视为威胁，所以很难确定这种合作应该达到何种程度。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东盟国家同中国和美国分别建立了多渠道，多样性的联系这样一个事实。

本文原题为“JAPAN-ASE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本文作者三重大羽（Mie Oba）为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并在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担任客座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4月9日刊于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19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7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Adam Smith Institution (ASI) 亚当斯密研究所

简介：ASI是英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自由化的改革领导者。它以《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命名，方针是经济自由主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立以来，它在积极实践把选择和竞争引进到公共服务上来，在巩固个人主义、减税、消减落后法规和杜绝政府浪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协会通过他们的研究、报告、学术会议、政治家和期刊的简报、网站和博客、报纸、广播和电视来推广和散播他们的理念。

网址：<http://www.adamsmith.or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

简介：AEI成立于1943年，是一家私人的、非党派、非盈利机构，从事政府、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和教育。AEI的目的是通过从事与当前最重要之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为领导人和公众服务。AEI下设七个研究部门：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政治与公共舆论、教育、健康、能源与环境以及社会与文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AEI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7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9名。

网址：www.aei.org

The World Bank (WBG) 世界银行

简介：世界银行（WBG）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简称，“世界银行”这个名称一直是用于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这些机构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其一开始的使命是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的重建。今天它的任务是资助国家克服穷困，各机构在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网址：<http://www.worldbank.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IS)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

简介：RIS 是印度外交部所属的独立智库，专注于国际经济问题及发展合作方面的政策研究。它还承担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能力建设及开展有效政策对话的论坛职能。RIS 的工作计划旨在促进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各种论坛的多边磋商提供支持。RIS 也为印度政府与合作伙伴缔结全面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提供政策分析。

网址：<http://www.ris.org.in/>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2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 中，PIIE 在全球 (含美国) 150 大智库中列第 15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3 名。

网址：<http://www.iie.com/>